



沙汀评传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

邓仪中 著

重庆出版

6

沙汀评传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

邓仪中 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陈 琨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寇小平

邓仪中 著

沙汀评传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2.125 插页5 字数287千

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

ISBN7-5366-2259-7/I·428

定价: 6.80元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序

陈 涌

—

现代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革命就其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不同于过去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新的特点，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面也得到了反映。

从“五四”开始，在西方为革命作准备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显露出它的矛盾，一方面，这些曾经表演过革命作用的思想已经为取得统治地位的西方资产阶级所抛弃，或者遗忘，但它在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还能继续保持着它的革命的启蒙的意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暴露出自己的脆弱无力，这在西方革命时期和革命的准备时期，还不是明显的，在中国却令人清楚地看到它经不起严酷的现实的检验。

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在自己的作品里直接反映出被压迫的农民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他写于1925年的《伤逝》已经揭示出脱离人民，脱离整个社会解放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只能以令人黯然的悲剧告终。这象征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实际上也呈现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终归破灭的主题。尽管

以个人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在以后当它面对封建压迫的时候，还能继续发生它的冲击作用，但它的局限，它的矛盾，它本质上的脆弱性也随着人民革命运动的展开而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新的人民革命时代的流向，也为另一个有敏锐的历史感的作家所觉察。郭沫若最初也是以个性解放作为自己的诗歌的基调的，但他在1925年就说自己“在最近一两年间”，“完全变了”：

我从前是个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文艺论集》序）

只要我们站在现代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高处，就有可能对“五四”前后的文化思想的变迁，做出正确的观察和评价。过去就有不少人看到，各种西方的思想都被引进中国，其中不少都曾经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但他们都像是走马灯一样很快过去了，所以有人说，西方经过几百年完成的思想历程，在中国一二十年间便走完了，原因正在于，时代毕竟不同了，原来在西方曾经起过革命作用的思想，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刚才提到的个性解放思想，它们在中国刚一抬头，便发现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屹立在它的面前了，这是西方英、法等资产阶级在他们革命时期所没有碰到过的。

欧洲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在文学上都推出过自己的伟大的杰出的作家，但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至无产阶级已经出现，已经走向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虽然无产阶级文学已经产生，已经出现

了“宪章派”诗人和“巴黎公社”诗人，但真正伟大作家的产生，还要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代。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出现以前世界文学的最先进的部分，一大批伟大杰出的作家像灿烂的群星一样涌现出来，他们不少人不是自觉的至少也是在实际上与俄国人民解放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虽然马克思主义也很早被介绍到俄国，由于19世纪直到八九十年代无产阶级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这就使得当时俄国最先进，最伟大，最杰出的作家，也没有可能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正如列宁所说的，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没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面前停住了。俄国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是在19世纪末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以后产生的高尔基，他同时也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是发生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在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大批具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优秀的杰出的作家，而且他们当中最先进的最有才能的那部分人，都陆续地走进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是许多中国作家所走过的道路。中国最伟大最杰出的作家都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中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作家，他们不但在思想上站在我们时代的最前列，而且在艺术上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有现象，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

二

但在整个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应该是统一战线的。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所谓“两头

21190/17

小中间大”的国家，就人数来说，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是少数，而中间阶层却是人数众多的。反映中间阶层的思想情绪的作家，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也是多数，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大都有民主要求，他们在文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对生活有自己熟悉的方面，其中不少人还有比较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中间阶层的作家，尽管在思想上有弱点，但他们都程度不同的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他们是文学上的重要的力量，他们中的优秀的杰出的作家，在文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共产党员的作家应该和一切具有民主性和现实性的中间阶层的作家合作，正确地评价他们的作用和贡献，承认和尊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完成中国艰巨的革命文学的任务。

中间阶层的作家的思想通常有两重性，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思想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只有对少数投靠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作家，才应该坚决加以揭露和抨击。

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初期，我们一些刚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艺界的左翼积极分子，却对鲁迅、茅盾也加以错误的批判和打击。鲁迅不但早已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作家，而且当时正处在走向共产主义的转折时期；茅盾在1925—1927年以前便是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党员之一，只是在1924—1927年革命失败后，产生过悲观、消沉的情绪，但他并没有脱离革命。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对鲁迅、茅盾的批判斗争是违背党的正确政策的。以后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第三种人”的批评，无疑有它的必要性，但除了鲁迅、冯雪峰少数人外，也有“左”的、过火的缺点，这也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的。

尽管思想强弱的程度不同，各个不同的时期表现各不相同，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便存在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大体上是属于民主主义的，他的《人的文学》被认为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思想革命”的一面旗帜。他从“人”的观点提出反对中国中世纪的黑暗的问题，虽然这不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迟缓的回响，但在当时，却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但也和一般抽象人道主义思想一样，它总是幻想不经过革命的方法便使人和社会臻于至善。他的这篇“思想革命”的宣言书也没有忘记向富人劝说从善。他也曾经在中国传播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但时候已经到了20世纪，这种“新村主义”只能说是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贫弱的漫画化的表现。如果说，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幻想不经过阶级斗争到达人类生活的福地，但在当时是一种不成熟的阶级关系的反映，有它产生和存在的充分的合理性；那么，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人民革命运动正在勃兴的中国，这种“新村主义”还能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实在是一个疑问。

周作人在20年代末以后，便越来越倾向于自由主义，他后来的公开倒向敌人的怀抱，是他自由主义思想，或者说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

林语堂也和周作人一样，也有过从民主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变化。他在20年代中国黑暗专制的军阀统治下，曾经做过勇敢的战斗，也因此，他和鲁迅有过密切的战友的情谊。以后他创办《论语》，提倡“幽默”，主张“闲适”，主张所谓抒写“性灵”，也倒向了自由主义。这个时期他不但完全失去了民主的战斗的精神，而且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实际上起了麻痹

群众革命意识的作用。鲁迅曾经耐心地对林语堂做过劝导的工作，也做过针锋相对的原则的斗争，在他认定林语堂无法扭转，才终于和他决裂。

但林语堂以后在国外，致力于创作和学术研究，仍然做过对中国文化建设有益的工作。

我们不能不看到，尽管在第一次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的中等资产阶级整个说来，是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这时候像徐志摩、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就其思想的实质来说，是属于自由主义的，或者说是民主个人主义的，但他们的创作活动，还具有民主性和真实性，特别是沈从文，在小说艺术方面有重要贡献，我们的理论批评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任务，就在于如实地评价、记载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三

从“五四”以后，叙事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主要的，而且，鲁迅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的伟大成就，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继续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认为现实主义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不能独尊现实主义，如果说，在文艺创作上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需要有在形式和内容、思想和幻想的广阔的天地，也就是说，需要在共同方向下的广阔的创作自由，这不光是指选择题材的自由，风格流派的自由，而且也应该包括艺术方法上的自由。

在文学艺术的历史上，历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两大潮流，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潮流和浪漫主义的潮流，原因就是人类生活当

中，同时存在着现实的方面和理想的方面，就个人的气质、性格来说，也有倾向于求实和倾向于理想、想象和幻想的差别，这反映到文学艺术上来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差别。中国文学艺术中所谓的写实和写意，大致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简要的提法。不论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不论是写实和写意，只要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都有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他们各有千秋，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可以并存，也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结合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过去曾经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是合理的，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只有革命的现实主义，才能用革命的世界观来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而浪漫主义却往往歪曲生活，是唯心主义的，这种看法是不合事实的。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从“五四”开始在中国文学上便是并存的，也是互补的，这从鲁迅和郭沫若同时出现，也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鲁迅和郭沫若，无论个人的气质，性格，生活经历，所受的文化艺术的承传，以及由此所走的艺术的道路，都是很不同的，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成为两峰出云，互相映照的景观。

鲁迅更倾向于求实精神，他比别的许多人都更深刻地领会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脱离人民的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痛苦的教训，这使他从“五四”一开始，便进入深沉韧性的战斗。尽管在他年轻时代，也曾热衷于浪漫主义，他的《摩罗诗力说》主要推崇的正是浪漫主义诗人，但从辛亥革命以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辛亥革命的经验就成了他的思想活动的中心点。他清楚地看到，中国过去封建主义的历史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越出封建主义的范围。过去的历史不外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历史。他激切地呼唤新的“第三种时代”的到来。但他采用的艺术手段是现实主义，他比当时任何一个

作家都更深刻理解，也更沉重地承受我们民族的和人民的苦难，这使得他的作品在揭示现实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方面，都达到中国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的高度。

郭沫若却以和鲁迅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如果说，鲁迅的现实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相联结，是符合中国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那么，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也是这样。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也同样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甚至比鲁迅的热情更高昂，用更激越的声音呼唤中国的“再生”，呼唤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但他更多的是依据自己的艺术家的敏感，他敏锐地感受到那个时代沉重的苦闷的气氛，也敏锐地觉察到新的时代正在他的面前展开。他的浪漫主义的长处并不在于对现实矛盾及产生的根基做具体的表现，但在他的《女神》里，在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方面，在作家的主观热情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鲁迅之于现实主义，郭沫若之于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可谓各极其长。他们两人典型地集中了新时代到来的中国现实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这就是现实的方面和理想的方面。我们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浪漫主义，或者相反。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伟大的杰出的代表。

四

和过去一样，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是经历了人生之后再创作的，因此，他们大都总是以写自己最熟悉，最倾心的题材开始，而一个作家当他生活在历史的激流里，或者至少他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觉察到时代发展的征兆的时候，写他自己熟悉的题材，便有可能到达艺术的现实主义。20年代末，发生了很大反响的矛盾的《蚀》，和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便都属于这样的作品。

茅盾从20年代初开始，便不但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勤于写作的文学评论家，20年代中期，他生活在当时中国大革命的激流中，他当时并没有想到创作，但在革命遭受挫折、流产，他痛定思痛，在不得已于言的强烈的内心要求下，开始执笔创作。一方面，革命的失败，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困惑、迷惘、以至消沉、悲观，这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了不轻的阴影，但即使这样，这位深受写实主义影响，坚持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信条的作家，却在他的三部曲《蚀》里，给我们留下了这次大革命的很大程度的真实的画卷。

《幻灭》，表现几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期间的种种幻灭感，但三部曲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第二部《动摇》，它对一个县城的令人惊心的阶级搏斗的描写，至今，仍然以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使人激动，使人信服。这部作品对1924—1927年大革命的“解剖麻雀”式的正面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第一次，而且，至今可说还是唯一的。

《蚀》的第三部《追求》，表现大革命失败后一群灰色的知识分子的动向，他们各有追求，但又都终归幻灭。这部作品令人感到作者更深沉的悲观情绪，但同时，作者的现实主义也使得它在革命转入低潮以后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得到相当真实的表现。这里写到的几个知识分子都各具特色，其中章秋柳是更具特色的一个。

从章秋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五四”以后，一部分知识青年对性解放的理解。这类思想当然首先是对封建贞操观念的束缚、遏制的反拨，但在她身上已经变成对两性关系的放纵，变成类似俄国十月革命后一部分青年的“杯水主义”。章秋柳在爱情问题上也确实像喝一杯开水一样地平淡和随便。但如果茅盾的表现到此为止，那么这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但章秋柳在她周

围的知识分子中是有着比较深沉的内心世界的一个人，她对当时革命低潮时期的悲剧气氛，是感触最深、愤激、同情、悲悯的感情也最深的一个。当她看到自己的朋友简直不知道怎样排遣自己精神的空虚苦闷的时候，当她看到自己的一个要好的女友王诗陶竟至于出卖自己的肉体，而使自己的青春完全萎谢了的时候她愤激了，认为这是令人“惊人的美之衰落”，“她想起许多朋友的青春的生命都被灰色的环境剥蚀尽了，只剩下一些渣滓；王诗陶不过是许多中间的一个例子而已。”这是一个思想感情境界高出她周围的灰色环境里的同辈们，她的“热烈的生活欲”，她对朋友的真诚的关心，成为激起对方重新生活的勇气、动力的女子。她周围的同辈大都失掉理想或者本来没有理想而显得平庸，而她还能够成为那个灰色环境里的一线光亮，她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她是茅盾早期的一个艺术的发现。

但在表现那些以个人为中心，追求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的民主知识分子的形象，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角，看来更深刻，更集中，更有典型性。“五四”时期更典型的民主知识分子是觉慧型的，尽管巴金的《家》是在30年代创作的，但觉慧这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它的典型意义更是属于“五四”时期的。那时具有个人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面对着的是封建主义。他生气蓬勃，勇往直前，充满自信，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局限，他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单纯的，能够保持“五四”思想解放时期的先进人物性格的完整和坚强。像前面所说的《蚀》里的章秋柳的复杂矛盾，在他身上是没有的，尽管从思想本质来说，觉慧和章秋柳是一样的——一样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只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历史情势，使得同样性质的思想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罢了。

在章秋柳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不但有她个人和社会的矛盾，而且也有她自身的矛盾，这就是说，不但有民主思想和周围的封

建主义的矛盾，也有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准确些说，后面这种矛盾本来是这类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突现出来。这归根到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第一次大革命遭受挫折、流产，而阶级搏斗却更加深化、残酷，人民革命更加深入，处在中间状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剧烈的冲击的结果。

但这时候，章秋柳虽然也表现出复杂的矛盾的性格，她毕竟还没有像丁玲所创造的莎菲女士那样矛盾已经发展到异常激烈的程度。一方面，莎菲对周围的平庸、腐朽的世界是敌视的，当她发现她钟爱的凌吉士“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资本家……这便是他的志趣”！这时候，她蔑视他，鄙弃他，认为他有一个“卑劣灵魂”。但是，像凌吉士一样，能够在上流社会，更具体地说，做各种体面的活动，能够出国“留学哈佛”做外交家，或继承资本家家庭的事业的男子做自己未来的丈夫，不正是半殖民地世俗妇女的人生理想么！但莎菲对此却表示极端蔑视和鄙弃，看来她已经和她周围的那个旧世界决裂。但她这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更可靠的精神支柱。因而凌吉士的美貌和“丰仪”仍然继续激发她的爱情的狂热。她的人格分裂，精神极度空虚。她反对平庸，但她自己也陷入平庸，她反对旧世界，但她自己也不能不属于这个旧世界。

莎菲的矛盾是即将破裂的矛盾，她面临的是濒于绝境的精神危机。这个人物当然不能代表当时历史的潮流，但在她身上，不是从一个角度也令人感受到历史潮流的汹涌，听见社会前进的足音么？

“五四”以后，在她之前，像莎菲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上是没有出现过的。正是因为这样，就使得这个人物成

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史中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环节。

五

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里已经预告：“……我希望我能够振作，不再颓唐；我相信我一定能的，我看见北欧命运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

事实也正是这样。茅盾很快就从困惑、迷惘、悲观、消沉的低谷重新振作。此后他写了一系列思想情绪与《蚀》完全不同的作品，而《子夜》成了他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峰。

茅盾对他这部作品曾经做过自白，说是为了回答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问题而作的。这个问题在当时中国引起广泛激烈的争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认识中国国情的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茅盾这部作品，在广阔的画面，从各方面显示出现代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击破了当时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或者说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观点，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反响，是左翼文学的一个重大的收获。

正是有深厚的艺术准备和艺术经验的作家，才有可能创作这样巨大规模的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的作品。这部作品许多部分许多人物都具有艺术的真实性，是一直为多数论者，也为多数读者所承认的。人们不能不看到，茅盾这部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很大一部分在过去是没有作家涉足过的。在没有先例，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他为我们提供了吴荪甫等一系列中国的各种

类别的资本家的比较真实的形象，而且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我们评价茅盾这部作品不能不考虑到这点。

但《子夜》却又确实存在着一个对社会主义文学说来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通常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把文学看成是总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看作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手段。这在原则上是不应该有什么疑问的，而且任何比较重要的作家，不论他的观点怎样，总是要面对现实生活的迫切问题，并且通常总会得出自己的答案的，这也不难理解。问题只在于艺术家有自己接近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特有的方式。艺术家当然也可以同时是理论家，但是如果他在艺术创作的时候，不是把理论思维渗透到艺术思维中去，成为它的有机部分，而是让理论思维排挤乃至压倒艺术思维，让理论思维占优势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削弱艺术的真实。

艺术要从特殊悟到普遍，而不是寻找特殊的东西来表现普遍，这微妙的差别显示两种不同的艺术方法的分野。

《子夜》一开始，吴老太爷一到上海，便经不起上海五光十色花花世界的刺激而很快死去，用这来象征封建僵尸一见空气便腐烂，这类表现不能说在《子夜》是普遍的，但也并不是个别的。整个说来，这部作品的形象不够丰满，作品的思想倾向往往过于直露，不少时候浮在艺术形象的表面，而不是溶解、渗透到形象里面。瞿秋白在这部作品出版不久，便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子夜与国货年》）。稍后，朱自清肯定《子夜》是一部“真能表现时代”的作品，但同时也说，这是“细心研究的结果，并非写意的创作。”

瞿秋白正确地评价了《子夜》创作的特点，它的意义和价值，但他也不自觉地说出了这部作品隐含着的缺点和弱点。闻一多也

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的特点，但含蓄地指出了它的缺点和弱点的所在。这个缺点和弱点在整个革命文学历史上可说是带有一般性的，这实质上是一个思想倾向性和艺术真实性的关系问题。

六

政治和艺术，倾向性和真实性，是社会主义文学几乎每天都可以碰到的一个根本问题。过去文艺指导思想所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偏向，主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向，主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从两个相反的方面出现的偏向；或者从思想、政治这个方面去排挤以至否定艺术真实，或者用艺术真实这个方面去排挤以至否定思想政治。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有无数经验反复证明这两种偏向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的。

这个问题，要从文艺思想上着手解决，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在深入到生活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为什么不少经过了思想变革，具有革命的世界观的作家，问题往往出在艺术真实是否充分这个方面？一个作家，如果他的思想方向是正确的，同时又有比较雄厚的生活底子，就是他能够创作思想和艺术都有较高水平的作品的条件。当然，我们还不能忘记，艺术上的准备，一般文化修养也是不可少的重要的条件。这是自不待言的。

茅盾在创作《蚀》和丁玲在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都是经验了人生之后再来创作的，这使他们有更饱满更深厚的生活基础，因此，也容易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求，作者下笔更容易得心应手，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也更容易令人觉得真切、自然。茅盾、丁玲这两部早期作品，便都是这样的。当他们思想已经逐渐跨进了新的世界观的门限以后，他们当然仍然可以在新的世界观的对照下继续写他们过去熟悉的生活，但是，大多数像他们那样已经